

司 汤 达

红 与 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司 汤 达
红 与 黑

一八三〇年纪事

郝 运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上海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本书根据 Editions Garnier Freres, Paris 1955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红 与 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625 插页 4 字数 592,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76,001—261,000 册（内精装 3,800 册）

ISBN 7-5327-0032-1/I·016

书号：10128·689 平装定价：3.75 元



司 汤 达

LE ROUGE ET LE NOIR

CHRONIQUE DU XIX^e SIECLE,

PAR M. DE STENDHAL.

TOME PREMIER.



PARIS.

A. LEVAVASSEUR, LIBRAIRE, PALAIS-ROYAL.

1831.

一八三一年在巴黎出版时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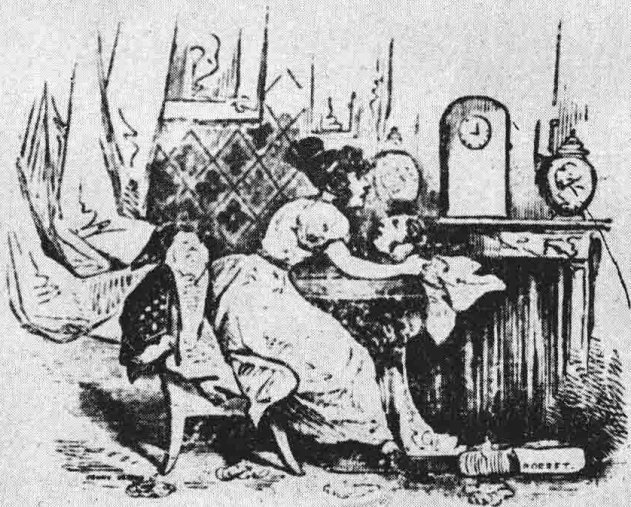
(上卷)

LE ROUGE ET LE NOIR

CHRONIQUE DU XIX^e SIÈCLE,

PAR M. DE STENDHAL.

TOME SECOND.



一八三一年在巴黎出版时的封面

(下卷)

译 本 序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和遥远的俄罗斯立即引起两位文学天才的注目。耄老的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①；青年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②。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些“机器人”^③；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④。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纸型便被束之高阁。

这正是司汤达在世时整个文学际遇的一个缩影：他所写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长期躺在书店的架子上；只有巴尔扎克为他的《巴马修道院》写过一部题为《亨利·贝尔》的专论，发表了有份量的赞许。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

十年代以泰纳^⑤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红与黑》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杰作,早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对于《红与黑》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强劲的生命力,中国读者更是深有所感。在我国,它虽几度遭到非科学的对待,然而人们对它的喜爱并未稍减。现在这个更加完美的中译本的应运而生,可以说是又一个佐证。

司汤达在为《红与黑》初版所写的“出版者告读者”中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写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⑥发生……时,已经作好了出版的准备工作”。这句话只有一半真实。我们知道,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司汤达,对一切都心存疑窦,因此处处设防,养成了掩掩藏藏的习惯。为了能在作品和书信中畅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检查当局的纠缠,他使用的笔名有四十来个,落款达七十种之多。他最常用的笔名“司汤达”,几乎代替了他的真实姓名玛丽-亨利·贝尔。在《红与黑》写作年代上,他同样真真假假。今天已经证实,虽然确如他所说,《红与黑》在一八三〇年七月已准备好发表——有他这年五月与出版

① 《歌德谈话录》,一八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的谈话。

② 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给妻子的信。

③ 《星期一漫谈》第九卷。

④ 一八三〇年《巴黎评论》。

⑤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哲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

⑥ 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

商签订的合同为证，但它的写作年代却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约半年时间；至于小说的构思，则最早只能始于一八二八年，因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几期《法庭公报》，向作者启示了未来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①

对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的各种文献嗜之为癖的司汤达，是《法庭公报》的热情读者。一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几期《法庭公报》对伊泽尔省重罪法院正在审理的一桩刑事案件的报道映入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这样的：现年二十五岁的安托万·贝尔德是布朗格村一个马掌匠的儿子。他身体孱弱，不适合体力劳动，但在学习方面却颇有天分，村里好几位头面人物便设法帮助他进身教会。当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学文化。一八一八年，他进入了格勒诺布尔市的小修院。一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断学习，经那位本堂神父介绍，受雇为米肖先生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年轻的家庭教师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米肖夫人发生恋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扫地出门。此后，他两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辞退。他重又寻求走教会的道路，也均遭拒绝。他把自己的厄运归罪于米肖夫妇。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个星期日，他潜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后向自己，连开两枪，两人都重伤倒在血泊中。

发生在家乡的这桩未遂事件，引起司汤达浓厚的兴趣。他绝不以为贝尔德对米肖夫人的爱情有什么大逆不道。在与贝尔德相仿的年龄，他也怀着同样的渴望：“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

① 参看本书附录二：《安托万·贝尔德案件及死刑执行》。

得上它们。”^①不仅如此，他还曾对实现这种渴望信心十足：“伟大的热情能战胜一切。因此，我可以说，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②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在仰赖出身而得以享受荣华富贵的上层阶级青年身上已丧失殆尽，司汤达却仿佛在贝尔德这样的下层青年中发现了他所赞赏的这种品质。在谈到当时发生的一起类似案件时，他再清楚不过地写下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一个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细木工，杀死了他的门第高贵的情妇。司汤达在《罗马漫步》中就此事写道：“正当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失去强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象拉法格这样的年轻人中间，展开一种可怕的力量。这些青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从事劳动，并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挣扎下去。……他们保留着意志的力量，因为他们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后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以前也处在这几种状况：良好的教育，热烈的想象力和极度的贫穷。”^③

尽管富有“热情”和“毅力”，贝尔德和拉法格都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追求”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使司汤达诧异。在他看来，这只是绝好地证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则：“社会好象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④

① 一八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

② 一八〇三年致妹妹波琳娜的信。

③ 《罗马漫步》，一八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④ 《自我主义者的回忆》。

司汤达决定用贝尔德的故事，同时也参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构成他下一部小说的基干。

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提供着无数可资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这些素材产生出的成品却往往大相径庭，见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据贝尔德的案件，无聊文人完全可以泡制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说，而司汤达却创造出一部具有不朽价值的文学瑰宝，这绝非偶然。司汤达开始写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五岁。《红与黑》这部杰作的产生，可以说是他前此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导向的必然结果。

司汤达于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诞生于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律师世家的中产阶级，思想极其保守。母亲早逝后，一向对他冷漠的父亲再婚，索性把他交给一个神父教管。而他却乐于接受外祖父——一个信仰启蒙运动思想的老医生的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和家庭的矛盾发展为政治上的对立。当父亲因革命的胜利而惊恐万状的时候，他却欢欣鼓舞。小贝尔举着自制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里庆祝共和党人的胜利的情景，感人至深。从这时起，以雅各宾党人自命的司汤达，就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

在专为向青年一代灌输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学校学习三年以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第二天，司汤达来到巴黎，任陆军部秘书长的表兄达律将军安排他在部里工作。一八〇〇年、一八〇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随拿破仑大军南征北战。在意大利，他历次作战都大显身手，从中士晋级中尉，又升任参谋。在普鲁士战场，他出色完成征粮任务，博得拿破仑皇帝的赞赏。远征莫斯科虽是一场

灾难，司汤达却在军粮供应方面建立了奇功。据说在最惨痛的日子里他也军容整饬，表现十分沉着。他对拿破仑时代满怀留恋。他，一个近乎孤儿的青年，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热情、精力和才华，这在任何封建时代都不可想象。他从不讳言对拿破仑的崇敬。他把《意大利绘画史》(1817)献给这位“法兰西最杰出的伟人”。不过，司汤达首先是把拿破仑当作反对封建制度的统帅来加以崇拜的；在《意大利绘画史》和《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中，他也对拿破仑“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赐封贵族”等错误加以批评。这个著名的拿破仑信徒，归根结底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以后，司汤达深感“象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屈辱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于是前往直意大利米兰侨居。在那里，表面看他潜心于写作，实际上他并未脱离政治。他始终关注着封建复辟后的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他还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为把祖国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同一些意大利爱国志士发生了联系。一八二一年奥地利警察当局把他作为烧炭党人驱逐出境，并非毫无根据。

司汤达不得不返回复辟政权当政的法国。离开在意大利热恋了数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绝，曾在《论爱情》(1822)一书的手稿上画下一柄手枪，表达自杀之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结束自己。”在阔别七年的祖国，帝国时代的朋友们不是备受迫害就是屈膝变节。司汤达却很快便同复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对派领袖拉法耶特将军、本雅曼·贡斯当等人取得了联系。

司汤达自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约三十年的生涯，就这样与

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两种思想、两种制度在法国和欧洲范围的大搏斗紧紧相连。历史几经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终如一。诚然，一如他的政治观，他的社会观也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的反对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政论小册子《论针对工业家的新阴谋》中，他明白宣称：“我虽然希望这些人幸福，但我们不可能尊敬所有的农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无疑比同时代的所有法国大作家都进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当他提笔写下《红与黑》的第一页手稿时，夏多布里昂还在为复辟政权效命，巴尔扎克还在为封建阶级的败落而兴叹，雨果刚刚挣脱保王主义幽灵，他却作为一个老雅各宾党人，已经在长期斗争中亲身体察、透彻研究了法兰西的历史运动和社会现实。

司汤达动笔写作《红与黑》时，在文学上至少也已经有十五年的实践经验。据说司汤达逝世时雨果曾对他下过这样的评断：“司汤达先生留下了什么呢？要知道，他可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这真是大谬不然。对于司汤达来说，文学创作乃是他的政治活动的继续，这一点再明确不过。请看，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使他失去公开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以后，他立即流亡米兰，正式开始了文学生涯。《维也纳书简》（1814）揭示了再次沦于奥地利统治之下的意大利的社会现实；仅仅把《意大利绘画史》献给圣赫勒拿岛上的俘虏拿破仑，就是对欧洲封建君主的“神圣同盟”的一个挑战；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1817）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卓越的写作才能描绘了一八一四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以来意大利历史倒退的种种表现，洋溢着对拿破仑时代的缅怀之情……

由分别发表于一八二三年和一八二五年的两篇文章组成的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在反对伪古典主义的斗争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司汤达通过设想的散文体五幕悲剧《从厄尔巴岛归来》再次肯定了拿破仑的事业，这在查理十世继位后复辟势力更加嚣张的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然而，这部著作在理论上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尽管作者自称“浪漫主义者”，然而他比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们站得更高，整部著作中实际上鸣响着现实主义的基调：文学应当适应自己的时代，反映自己的时代。在《阿尔芒斯》（1827）的“前言”中，他在评论皮卡尔和马泽尔的一部喜剧作品时，提出了他喜爱的“镜子”说，他写道：“他们向公众出示了一面镜子；如果丑陋的人们经过这镜子面前，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红与黑》上卷第十三章正文之前的这句引语：“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考据学家们在圣雷阿尔^①的著作中并未找到它的出处，它倒更象是出自司汤达本人之口。这句话最形象而又完整地表达了司汤达小说创作的基本信条：小说是“镜子”，但它是拿在人的手里的。这一理论，既避免了纯客观主义，又坚持了真实性的原则，很好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髓。

中篇小说《阿尔芒斯》是司汤达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实践上述信条的第一次努力。它以一八二五年复辟政权颁布“赔偿流亡者十亿法郎的法令”为时代背景，通过一对青年恋人的悲剧，对妄图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封建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指控，虽然过多地渲染主人公们的爱情纠葛使主题受到削弱，却是一次有益的实践。相比之下，一八二九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更为成功，这篇小说通过一个革命与爱情尖锐矛盾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堪称短

^① 参见本书第98页注①。

篇小说中的力作。如果说这两部小说是《红与黑》创作的预演，那么司汤达的富有政治倾向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风貌，已昭然可见。

现在，我们就仿佛看到这样一副形象：留着浓密的连鬓胡须、明显发胖的司汤达手拿贝尔德案件的报道，但他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高度，胸怀丰富的社会政治阅历，抱定明确的理论原则，拥有长期的文学经验。他为自己未来的小说加上一个谦逊而又大胆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而《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杰作，首先就在于它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

把司汤达奉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者的左拉，责备司汤达没有表现出《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生活的那个世界。这很不公允。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这部小说虽没有自然主义者所偏爱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长篇琐细的描写，但它恰如其分的笔墨，却把时代气氛烘托得那么浓烈，历史特点表现得那么准确，社会状况勾画得那么清晰，阶级关系、特别是各阶级的政治关系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汤达告诉我们：德·雷纳尔先生从一八一五年起做维里埃尔市长，小说开始时他在这个位置上已为所欲为了十年；而十九岁的于连在这年受雇于市长家，到他在二十三岁时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四年。由此推算，《红与黑》所描写的是一八二

五年至一八二九年间的法国，即波旁复辟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一年的法国。

一八一四年，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阶级，虽然在英、俄、奥等欧洲封建君主国的刺刀庇护下在法国卷土重来，但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再也无法摧毁，复辟制度只能在旧贵族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复辟政权的关税保护政策等经济政策，也反映了这一点。复辟时期法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和发展。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关系愈来愈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

《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①。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象农民而不象城里人”^②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

人们在作者的引导下来到汝拉山脉支脉的这座小城，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由一条湍急的流水供给动力的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大部分……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刚走进城里，就听到一片震得人头痛的噪声，那是市长先生的规模宏大的制钉厂。然而，使这座城市富足的主要还不是这些，而是印花布的制造，“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就是靠了它，几乎维里埃尔的每一所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我们知道，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七月王朝统治时期。而在二十年代下半期的维里埃尔，兴盛起来的虽然还仅仅是几门“简陋的”或基本的工业，人们却着实感觉到在

① 参看本书附录一：关于《红与黑》。

② 引自小说《红与黑》。以下凡引自这部小说的文字，只用引号，均不一一注明出处。

这偏远的小城工业革命也正在临近的脚步声。

司汤达还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和风气也象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好心的老外科军医为了让索雷尔的儿子于连有工夫读书，教好他拉丁文和历史，反须付钱给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在同市长做的一次次交易中，这个锯木厂主表现了列那狐^①式的狡诈。连“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德·雷纳尔市长这样的顽固保王派贵族，也不免深受市侩风气的熏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例如在他看来，胡桃树之所以有权利存在，全由于它们“提供收入”；“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实属荒唐，“只有在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激发他的热忱”。金钱的考虑甚至可以牺牲贵族的“尊严”，得知妻子和于连的关系，他宁愿隐忍，就因为妻子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

然而，司汤达的笔墨主要还是用于刻画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象一切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实上，自一八一四年

① 法国中世纪文学《列那狐传奇》的主人公，以其狡诈屡胜代表大贵族的伊桑格兰狼和勃伦熊等。